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哲学意蕴

□ 王全良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中一条基本方略提出，是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灵魂和根本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

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目的性是指实践及其结果必须符合主体自身利益需要的价值追求。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根本目的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和现实途径，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另一方面，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最终价值目标。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保障，“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突出强调了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能力，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

规律性是指对实践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规律的认知和运用达到了新高度。面临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既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需要，同时也是对人民群众期盼美好生活的诉

求的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新发展理念，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理念随着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规律认识不断深化。

思辨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蕴含了事物的普遍联系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具有深刻的辩证性。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原因和结果的联系是事物或现象之间引起和被引起的联系，这一规律决定了人民群众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必然也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即“人民群众作为发展主体是原因，成为发展客体是结果”，要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做大社会发展“蛋糕”的同时要分好“蛋糕”，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本质上是实践的，形成于历史的实践，强调于现实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是共产党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实践过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在共产党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取得的基本经验和客观总结。

价值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要求以人民为标准、主体、目的，蕴含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落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执政价值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鲜明的方法论价值。其一，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明确回答“我是谁”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党必须注重自身的作风建设，恪守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先进性和

纯洁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党自身提出的道德要求、政治要求和纪律要求。其二，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作用，明确回答“依靠谁”的命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恪守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宏力量，要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与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有机统一起来。其三，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作为事业发展的目标，明确回答“为了谁”的命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事业发展成败得失的价值标准，要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发展红利，人民生活水平是否真正得到了提高，人民诉求是否真正得到了满足，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

（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6月6日上午，中央党校中青二班一支部开展社会调研交流会，共有6个小组发言。图为发言现场学员之间进行互动。 张涛/摄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在党校的阶段学习，我认为新时代推动人大建设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切实保障基层群众的选举权、表达权、参与权。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基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国家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日益迫切，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这对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出了新的课题。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我国人大制度的优越性，引导群众充分认识选举权是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变“要我选”为“我要选”，增强选民参选的内生动力，不断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的参选率。针对当下流动人口多、人户分离突出等新问题，充分运用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提高选民登记、资格审查、选区划分的精准性，做到不漏登、不重登，确保群众的选举权得到真正落实。严格执行选举法和各地的选举法规，确保选举依法依规、风清气正，真正把那些政治素质好、热心为民办事、群众公认的人员选为人大代表。

进一步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联系，切实为群众摸实情、代好言、献良策。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当代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反映群众利益诉求，为人民谋利益。人大代表要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代言人”。各级人大代表应充分倾听和反映基层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求，把老百姓的各种利益诉求及时反映给各级党委和政府，当好人民群众的“传声筒”“代言人”，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抓住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提出高质量、可行性强的议案和建议。同时，密切关注议案建议的办理情况，加强与承办单位沟通协调和督促检查，切实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老大难问题，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大代表要把群众的呼声带到人民代表大会上，认真听取和审议各项报告和议案，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共同讨论决定本地区的大政方针。人大代表要定期回原选区和原选举单位述职，报告自己的履职情况，使人大代表始终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约束之下。

进一步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公仆意识，切实为人民掌好权、履好职、谋好利。牢固树立对人民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受人大监督就是受人民监督的理

从三方面推动人大建设

□ 洪开开

念，自觉把权力置于人大监督之下。深入实施监督法，充分运用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预决算审查监督等法定方式，加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提高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当选国家主席后，带头在现场进行了宪法宣誓，彰显了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决心，也为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树立了典范。坚持和完善宪法宣誓、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等制度，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不断增强人大选举和任命干部的宪法意识、法治意识和公仆意识，自觉维护和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履行职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挖掘和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中央党校第44期中青一班一支部调研组

核心阅读

文化扶贫既要“富脑袋”，又要“富口袋”。只有在精神激励与物质丰富的合力下，才能形成拔穷根、真脱贫的决胜之势。

（一）

近年来，贵州全面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打响脱贫攻坚四场硬仗。同时，以“大文化助推大扶贫”为突破口，积极探索文化与扶贫融合的道路，取得了积极成效。

贵州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近年来，贵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打响脱贫攻坚四场硬仗。同时，以“大文化助推大扶贫”为突破口，积极探索文化与扶贫融合的道路，取得了积极成效。他们的主要做法，一是统一思想认识，强化战略谋划顶层设计；二是摸清文化

家底，挖掘文化资源内涵；三是整合文化资源，打造大文化产业链；四是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文化扶贫共建共享模式；五是发挥“文军”力量，推动文化扶贫向深阔拓展。

通过深入调研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等各类文化资源在激发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重塑发展格局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和作用机理，特别是了解到文化助推扶贫产生的重大变化和显著作用，对我们触动很大，从贵州的实践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文化发展是我国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就需要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挖掘文化资源，增加文化产品供给。扶贫先扶志，脱贫先治愚，贵州的实践证明，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文化自信是最好的减贫剂，文化扶贫扶起的是志气骨气，传承的是家国情怀，守护的是绿水青山，融合的是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呼应着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文化扶贫必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短短几天，调研组从贵州当地群众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正是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带领下，以往经济落后、缺乏文化自信的贫困人口开始成为自信自得的文化主人。“党建+文化”的融合碰撞，不仅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把准了方向，而且为“文化+”扶贫事业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树立文化自信需要精神与物质双管齐下。文化扶贫既要“富脑袋”，又要“富口袋”。只有在精神激励与物质

丰富的合力下，才能形成拔穷根、真脱贫的决胜之势。要加快发展、加快转型，光讲经济规律还不行，还得讲精气神，让他们看到所在地区和自身蕴藏的文化资源，以及这些文化资源的开发潜力，使他们切身体会到构筑精神高地可以冲出经济洼地，文化软实力是可以转化为经济硬实力的。

以文化为魂后发追赶可以实现弯道超车。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性，文化扶贫可以为地方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发赶超提供独特路径。贵州实践告诉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完全可以与高端的产品、科技、市场进行直接对接，历久而弥新的文化产品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同时，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将贫困地区与都市消费圈直接连接了起来，客观上抬升了生活和消费的水准。更重要的是，文化扶贫还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学习效应、溢出效应，为贫困群体拓展视野、打开思路，带来经济自立与文化自信，成为后发赶超的真正动力源泉。

（二）

贵州的实践证明，文化在激发脱贫意志、助推脱贫攻坚中具有独特作用和巨大力量。如何推动在全国层面让文化的精神和价值惠及更大范围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使脱贫的意志植根于文化的血脉，还需要继续探索与创新。我们认为，应该在“五个更加注重”上下功夫。

更加注重发挥文化在决战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已进入决胜的关键时期，剩下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石山区、

深山区、极端干旱山区、高寒阴湿地区，发展一般的脱贫产业难度大。但是，这些地方往往是革命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山地文化、历史文化资源的富集区，对于发展文化旅游、推进文化扶贫来说，具备宝贵的资源潜力。建议各地政府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挖掘文化资源，调整扶贫工作重心，将文化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在实际工作中，要在高度重视、统一认识的同时，及时跟进超常规措施，从战略规划、专项行动、配套措施、部门协同、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作机制，进行优先保障，压实目标责任，形成各级政府统筹、各部门专班负责，全社会同心协力推进文化扶贫的格局。

更加注重处理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原则，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原生态与现代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明确文化旅游、文化项目及周边地区开发秩序、开发强度、开发边界，保护文物价值，保护天际线，提高规划约束力，抑制破坏性的开发冲动，避免同质化、低水平开发。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进行生产开发，建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推进传统文化记忆工程，在实践中培养传承人，在市场中实现传承。建立全民参与的文化保护机制。落实传统村落保护计划，创新注重方式，通过从文化旅游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文化资源保护资金、成立专项基金等形式，资助老百姓履行文物保护、修缮、消防职责，

形成“人人参与文化保护，家家成为民俗博物馆，户户都是文化保护场所”的良好局面。

更加注重文化公共服务与文化产业扶贫合力共振。在推进学校、农家书屋、文化站、通信村村通等方面建设的过程中，结合文化传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文化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处理好“送文化”与“种文化”的关系。既要向乡村输出文化，又要提升老百姓主动挖掘、传承、创造文化资源的能力。处理好“政府买单”与“群众买账”的关系。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文化特色和阶段需求，更多帮助群众解决工艺难题，提供市场信息和致富路径。处理好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进一步发挥文化企业、协会、志愿者、学者等主体在文化扶贫中的作用，提高文化“扶智扶志”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结合度。处理好传统文化建设 with 先进信息技术的关系。抓住“数字机遇”，打通电商“最后一公里”，发挥广电云、物流云、扶贫云作用，推动“大数据+大文化”深度融合。

更加注重打造文化产业链和集团军。加强资源整合、项目整合、资金整合，形成开发合力，改变单点开发、作坊式经营、分兵作战的状况，大幅降低开发成本、提升开发水平。构建文化产业生态系统。鼓励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做专、做特、做新。打通文化产业链条。结合地方资源禀赋，整合地方文化资源，形成文化村落、文化小镇、文化走廊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民族

演艺、音乐、工艺、节庆、出版、广播电视、会展精彩纷呈；“文化+农业观光、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商贸服务、加工制造、创意设计”多元组合；“党建+企业+基地+合作社+文化传承人+农户”利益联结的大文化扶贫开发格局。打造大文化产业集团。借鉴工业产业项目组织的经验，专班化抓项目资金落地、抓结构调整、抓产销对接，减少中间环节，特别是在加强财税金融土地保障、给予文化企业更多税收优惠方面出台实质性支持举措，促进扎根贫困地区的文化产业集团发展壮大。建立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文化产业专项基金。支持和鼓励各类企业投资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扶贫事业。

更加注重培育文化扶贫人才。推广贵州经验，将文化事业与大数据、大生态、大扶贫等重大战略行动统一起来，极大地打开事业空间、拓展创新思路，将各方面的人才引过来、用起来。既吸引顶级的文化创意经营人才入驻，又为打工者、游学者提供良好的生活创业环境。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借鉴贵州农民讲习所的经验，整合教学资源，创新固定课堂、空中课堂、流动课堂、田间课堂相结合的“四个课堂”模式，结合网络教育、远程教育，通过教学、大赛、大师培训计划、专项合作等，为各类人才提供成长舞台。

（调研组组长：冀国强 天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成员：薛其坤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科院院士；任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杨晓和 河北省审计厅厅长、党组书记；肖凯林 贵州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程晓波 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